

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

葛 壮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以近代社会变迁与宗教的相互关系为课题,选取了上海为典型样本进行研究。全书纵向地介绍了沪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并兼顾到各教彼此之间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横向关联。作者的视角主要定位于宗教自身的社会功能及其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充任的角色、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政治的内在关系、城市开放后的社会生活变化和宗教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故此特分上、中、下三篇加以述论。

在上篇“近代上海大舞台上的特殊角色”中,作者分别从近代上海城市生活、文化交流、慈善事业、教育卫生和社会政治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各宗教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中篇“社会政治风雨涤荡下的宗教衍变”,主要叙述了近代上海宗教面对各种历史挑战而作的不同回应,其中包括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给沪地宗教带来的冲击,以反洋教的教案为标志的社会排拒对天主教、基督教的影响,和民国前期沪上各宗教所出现的振兴气象,以及申城宗教界在抗战到解放前夕的历史表现。在下篇“开放的城市和开放的宗教”中,作者就海派文化氤氲下沪地宗教的发展,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同时也述及了近代来沪侨居的犹太人与白俄社区及其相关的犹太教、东正教等内容,从而深化了对在近代上海“华洋共居”开放性社会环境中的外来宗教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此外,本书的行文较为流畅,夹叙夹议,随文附有较多的插图,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序 言

上海从近代开始就进入了她的辉煌时期。

她从一个东海之滨的小小渔港变成了远东地区特大型城市，她从一个偏居海隅的物产集散地变成了中国和远东的工商业贸易中心，她从一个只有万余人口的城镇变成了具有百万人口的国际金融都市。

巨变，使上海充满活力，充满机遇，充满风险，充满陷阱，生活在巨变漩涡中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有的春风得意，有的秋风萧瑟，有的青云直上，有的一落千丈。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追求、搏击、获得、失落，有的充满自信，有的一往追求，有的又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不知去向。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海的宗教在近百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近代中国，上海的天主教、基督教一直是全国教会活动中心，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在上海获得振兴，道教虽然处在自生自灭之中，但由于它和民间信仰习俗有密切联系，因此上海的道教也保持着一定的规模。至于林林总总的民间宗教（公开的和秘密的）也都在上海寻找或找到了立足之地。在巨变的上海，宗教发挥的作用很复杂的。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它们具有社会秩序的控制作

用;作为一种信仰组织,它们又具有社会心理的平衡作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们又具有继承文化传统、交流和传播文化的作用。科学地分析宗教的作用,它们有正面的功能,同时,毋须违言,它们也存在负面的作用。但是,宗教作为近百年中主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对上海社会的变化、对上海市民的生活,发生过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各种宗教自身也适应上海社会的巨变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宗教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小的影响。葛壮先生的这本著作就是要说明和回答这些问题。

葛壮先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并在该校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有扎实的历史研究功底。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以后,一直服从工作的需要,独辟蹊径,从事他所陌生的伊斯兰教研究。但是,他从来不甘寂寞,学习刻苦,锲而不舍,博览群书,重视信息,研究的视野十分广阔,具有很强的地融会贯通能力,加之文思敏捷,文笔流畅。因此,这些年来,他的研究论著涉及到宗教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以及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诸多领域,多有发见,使人刮目相看。虽不能说件件精品,但也都是呕心沥血,字字用心,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读。这本著作就是葛壮先生在得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基金资助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写成的。

1992年,葛壮先生也曾参与其事的《上海宗教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已作古的著名宗教学家、出版家、语言学家罗竹风先生当时曾为之作序称:“《上海宗教史》在一片荒芜中踩出了一条路,即使高低不平,畸轻畸重,但毕竟填补了一个空白,可鼓励后来者不断前进。前无古人,正说明它的功绩;若后无来者,人类不就可悲了么?”罗老对中国宗教研究和学者们的期待和企盼,跃然纸上。葛壮先生在罗老生前曾聆听过他的多次教诲,并在他的指

导下从事过一些研究工作。今天,葛壮先生拿出这本著作来,也是以实际行动对罗老的期待和企盼的最好回应。当然,葛壮先生的回应,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材料的收集上、论述的角度上以及论点的创新上都有所建树。正因为如此,作为一本地方宗教史的新作,葛壮先生把对于上海宗教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

陈耀庭

1998 年季春

目 录

序 言	陈耀庭 1
-----------	-------

上篇 近代上海大舞台上的特殊角色

第一章 城市净土的开拓者	6
一、上海佛教的历史发展	7
二、沪上的道教文化	12
三、上海滩的穆斯林社区	15
四、天主教在申城的传播及发展	18
五、洋场中的洋教文化	24
第二章 文化桥梁的建筑师	30
一、麦家圈内的墨海书馆	31
二、骄人的业绩	35
三、出版界的后起之秀	43
四、益智书会和广学会	46
五、民国时期上海的对外文化交流	51
第三章 扶危助难的慈善家	54
一、首任耶稣会会长的远景规划	55
二、主教座堂的永久遗憾和教区事业的拓展	57
三、孤儿组成的村庄	66

四、基督教新教的努力	67
五、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	70
第四章 从事政治的宗教徒	73
一、神父的外交天赋	74
二、混迹政坛的传教士	83
三、投身革命的佛教徒	87
四、参加反清讨袁的穆斯林	89
五、“基督将军”身边的神秘牧师	93
第五章 教育卫生的先行者	100
一、传教的盘桓	100
二、近代上海宗教教育的嬗变	104
三、女子教育的发轫	108
四、苏州河北岸的“西点军校”	111
五、行医布道和治病救灵	117

中篇 社会政治风雨涤荡下的宗教衍变

第六章 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冲击波	133
一、破除偶像的政治运动	134
二、洋弟兄的不同反应	135
三、“红头”占领上海城和传教士的说降	142
四、忠王的错觉和“天王老师”的失望	148
第七章 社会排拒下的宗教发展	157
一、在教案的阴影下	158
二、庆典“作秀”和建堂造台	162
三、未能躲过的厄难	167
四、殊途同归	172

五、庚子事变的打击	184
第八章 民国前期上海宗教界的振兴气象	192
一、海上丛呈林新貌	193
二、紫气东来上海滩	200
三、伊斯兰教的成就	205
四、江南教区易旧颜	211
五、觉醒了的基督徒	218
第九章 从抗战爆发到解放前夕的申城宗教界	231
一、救死扶伤的和尚	231
二、穆斯林的爱国壮举	238
三、基督徒的中国心	241
四、困惑与抉择	251
五、分道扬镳	256
下篇 开放的城市和开放的宗教	
第十章 从泥泞的上海滩到东方不夜城	270
一、上海租界的元老	271
二、教堂、教士和教徒	276
三、“西儒”与“海天三友”	284
四、信仰上帝的中国学者	293
五、民众观念的更新与社会风习的西化	299
第十一章 移民都市里的移民宗教	307
一、犹太富商的宗教寄托	310
二、犹太难民潮涌入上海	318
三、犹太难民的宗教生活	323
四、沪上庞大的俄侨社区	331

五、上海东正教昙花一现	341
第十二章 海上社会与宗教的关系	347
一、海派文化的氤氲	349
二、名流、闻人与宗教	358
三、传播福音的中心	367
四、沪地环境对伊斯兰教的影响	376
五、佛教复兴在申城	383
注 释	388
后 记	408

上 篇

近代上海大舞台上的特殊角色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这个当时在中国尚不算太大的中等城市从此开始迅速崛起,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即使在上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在近代百年的历史风云中,它不仅奠定了自己作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之地位,而且随着开埠后西学东渐及西方文化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上海也相应地成为以海派文化为特征的全国文化中心。综观整部中国近代史,传统社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国家处于被列强蚕食鲸吞的危局中,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东西方文化的撞击,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内容。时代向人们,也向包括宗教在内的各个社会实体提出了新的挑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渗入到全社会不同层面的共识。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工业化大都市,“优胜劣汰”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从一定角度讲,近代历史上的大上海,同样也是社会各派政治势力及各式人物展示身手的政治大舞台。在这整整一个世纪的特定时空跨度中,上海的各个宗教,尤其是在实现了社团化、组织化以后,作为一支同城市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力量,不啻成为这座近代政治大舞台上的一个特殊角色。

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不同的宗教有其自己完整的教义、教规、礼仪和组织形式,在上海从古代一个枕江滨海的蕞尔小邑,跃然发展成东方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早已为传统社会接纳的佛教、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等世界著名宗教,甚至锡克教、祆教等域外

地区性宗教,都先后在上海这个舞台上露脸登场,有的只是匆匆过客,亮相而已;更多的却是就此站定,崭露头角,并在近代百年中呈现出各自的风采。

各个宗教传入上海的时间先后不一,有的比上海城市的正式建置都要早。中央政府正式在上海设县是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而在这同一地区,无论是在六朝初期的东吴赤乌年间(238~250),还是在六朝末期的陈朝祯明年间(587~589),均留有佛教流传于民间的历史遗痕。道教浸润上海地区的时间也不算晚,至迟在唐、宋两代,是地已有道士和道观的出现。另如伊斯兰教,则于宋、元间传入上海的松江等地区。至于被中国民众视为“洋教”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包括犹太教和东正教,其中除了天主教于明朝末年已传入上海外,都是在中国的大门被鸦片战争中的洋炮轰开之后,才堂而皇之地在上海滩得到传播与发展。

尽管各宗教在沪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程度大相径庭,其存在的规模与条件也迥然有别,但作为与近代上海社会政治关系相当密切,又与广大市民生活紧密关联的城市宗教,它们显然具有内在的共性。整个社会在步入近代化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样也迫使宗教作出自身的回应。不惟那些早就传入上海的宗教会在历史巨变的关头遭逢尴尬的处境与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就连那些与“洋大人”一起来到上海的洋教,又何尝不会在其需要不断地去适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品尝到个中的甘甜苦涩呢?

早已中国化和土著化的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原本就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若以上海开埠后的发展概况来看,近代经济的日趋繁盛也使它们兴旺发达起来,及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在洋教文化充斥的上海滩,照样能目睹云集沪上的各派高僧宗风大盛和诸山长老弘扬显密法脉的场面,也能看到道教在上海所呈现的那种香火旺盛、各派相长的景况,即便是在古代上海社会中鲜为人知的伊

伊斯兰教,随着全国各地来沪谋生的穆斯林队伍迅速扩大,一些清真寺也在近代,尤其是在本世纪30年代相继落成,伊斯兰教的文化事业亦在是时达到鼎盛。上述这些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宗教,在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时的历史关头,也许不像那些倚仗着洋枪洋炮保护的洋教占尽风流,能在十里洋场这座大舞台上一开始就成为担纲的主角,特别是在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汇融合过程中能挑起大梁。但当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帷幕被时间老人全部揭开,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渐为世人所确认之际,诸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界的社会团体及有关人士也都很快地站到了向近代化迈进的起跑线上,近代沪上涌现出来的隶属于上述各种宗教的寺庙景观、学校、研究部门和组织机构,以及为数众多的名流精英,和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等洋教文化一样,在描绘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长卷历史画轴中,也添抹了许多绚丽的色彩与写真的内容。

就如用一个脸谱无法来表示戏剧大舞台上的所有角色一样,宗教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时代进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也绝非能用某种单一的历史脸谱来加以形容,换言之,对于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种种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不能冠以简单的否定或肯定的论断。至于见仁还是见智,袭用一句套话,“是非留与后人说”。我们今天来臧否那些曾在近代上海历史上叱咤风云或长袖善舞的宗教界人士,绝非易事一桩,这也不是我们选此课题的初衷。说得透彻一些,历史的实践远比历史的评价重要。倘若读者阅后,对近代上海宗教文化的发展概貌及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能获得更多的了解,就作者而言,实在是最大的满足。

第一章 城市净土的开拓人

直到现在,翻开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新英汉词典》,在“Shanghai”这一个单词的解释上,除了人们所熟悉的“上海”之意外,还有“浦东鸡”的意思,该词的第三种解释则作为动词来表示,其意是“(用酒或麻醉剂)使失去知觉后劫到船上当水手”,并可延伸为“拐骗、胁迫”之意。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名号居然与邪恶的犯罪行径相联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可这种反差巨大的关联却正是近代上海历史的真实写照。

上海开埠以后,一度成为世界闻名的猪仔市场和苦力市场,如一艘名叫阿马拉号的外轮在 1849 年缓缓驶出上海时,就载运了 200 名中国苦力,他们是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批华人集体移民。及至 1851 年,短短数年,加州的华工已达 2.5 万人,其中不少还是上海人。他们在大洋彼岸的出现,正是一些来华的洋水手及中外人贩子坑蒙拐骗加上胁迫利诱的结果。其实近代上海社会的黑暗龌龊,又何止“拐骗”二字所能形容!无论是上海滩上的旮旯角落,还是灯红酒绿的豪华欢场,不是地痞恶棍、小偷无赖、娼妓嫖客和赌徒乞丐充斥内外,就是洋行大班、买办奸商、军阀政客和流氓大亨混迹其中。这里每天都在演绎着无数个人间的丑剧和闹

剧,主配角即由上述的社会渣滓群担任。据说这座号称远东第一大都的城市,在空气和水质方面,也同样肮脏兮兮,以至在开埠后的一段时期,那些想来沪发洋财的各国冒险家们,大多都只准备捞一票即走人,很少有人作长期留住打算的。整个城市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如此糟糕。

难道沪上竟真的找不到一方净土了吗?也不尽然。不要说那些为日常生活奔波和烦恼的广大社会下层市民有渴求精神安慰及祈求神灵佑助的需要,即便那些经常出入于纸醉金迷场所的上流阶层,也有许多人在酒足饭饱之余,还想寻觅能够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精神需求的地方。分布于上海地区的各种佛庙、道观、教堂及清真寺,就是这个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会中所存在的灵性世界,它们向世俗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洗涤灵魂罪恶及驱除愁苦心境的去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各宗教界人士,可说是扮演了“城市净土开拓人”的历史角色。

一、上海佛教的历史发展

沪上各教中,以佛教在上海出现的历史为最早。据说远在三国时代,就有一个来自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高僧康僧会,在东吴赤乌五年(242),“建立茅茨(草屋),设像行道”于龙华荡(今上海龙华镇)。以后又因此事惊动吴主孙权,在他专门召见这个祖先为西域康居国(其境在今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内)的胡僧时,后者向吴主请求建寺造塔,以弘传佛教,在孙权授意下,吴地最早的佛寺建初寺正式落成于当时吴国的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按照《高僧传·康僧会传》的说法,吴国同期还建造了13座佛塔,佛教这才渐行于江南。后来编修的上海地方县志也都载有类似的传说。此外,《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书还提到安世高(原安息国太子)、支谦